

南半球夏日的風

唐培良

當我收到赴澳留學的簽證時，接到了她的電話。電話的那頭，眼淚汪汪帶著哭聲她說：“我的簽證沒有來……。”

我與她的相逢及其偶然。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，澳大利亞駐上海領事館附近的街道上人來人往。她站在路口，顯得有些迷茫。她看見了我，便走過來問我：“請問，澳大利亞領事館怎麼走？”她的聲音有些沙啞，眼神里帶著一種說不清的疲憊。我點點頭，帶著她一起走向領事館的大門。那一天，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，她的身影也漸漸走進了我的生活。

就在我登機前一天，她的簽證奇跡般地批了下來。她打來電話，語氣裡帶著一種劫後餘生的激動，像是剛從懸崖邊被拉回來的人。

“你一定要來接我。”她低聲說，彷彿在向我索要一個承諾。我答應了，心裡卻像壓了一塊石頭，沉甸甸的。

悉尼機場，滿是接機的人們，那一天，從上海直飛悉尼的飛機，幾乎成了包機，載著中國留學生來到澳洲這片陌生而神奇的土地。

她遠遠地望見我，像是一隻迷失的小船終於找到了燈塔，猛然衝了過來。她的手臂用力地環住我的脖子，整個人幾乎掛在我身上，聲音顫抖著：“你來了！你來了！我真怕你不來接我，你要是不來，我該怎麼辦？”她的手心全是冷汗，像是剛剛從水裡撈出來的一樣。

到了住處，她已經疲憊不堪，眼眶紅紅的，像是一朵凋謝的花。我幫她安頓好，然後回到客廳，躺在那張略顯陳舊的沙發上。

夜晚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壓抑，一陣低低的啜泣聲從她的房間裡傳來，起初是細聲的，像是從喉嚨里擠出來的，隨後聲音越來越大，像是一場雷暴雨。

室友皺著眉頭，低聲對我說：“你帶回來的那女生怎麼回事？去看看吧。”我點點頭，起身走進她的房間。

房間里只有一盞昏黃的燈，光線微弱得幾乎看不清她的臉。她蜷縮在床上，雙手緊緊抱住膝蓋，眼淚像是斷了線的珠子，無聲地滑落。

“怎麼了？”我輕聲問，聲音盡量放得柔和。她搖了搖頭，沒有回答，只是伸出雙臂緊緊抱住我。我試圖鬆開她，她卻哭得更厲害了，整個人像一片搖搖欲墜的樹葉，無助地依附在我身上。我的手停在空中，不知所措。

她的眼淚和汗水混雜在一起，浸濕了她的衣襟，也沾濕了我的襯衫。空氣中瀰漫著濕潤的熱氣，夾雜著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和一種說不清的焦躁。她的呼吸急促，像是剛剛從一場噩夢中醒來。

“從小……我從來沒離開過上海，”她終於開口，聲音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，“我一句英語都不會，以後怎麼辦

啊？”她的聲音顫抖，像是隨時會崩潰。

我說：“那你怎麼想到要出國的呢？你家裡人怎麼會讓你一個人出來的呢？”

她說：“從小嬌生慣養，家裡人都慣著我，以為自己什麼都行，心血來潮地硬要出國，家裡人怎麼勸都勸不住，出來才知道，自己是多麼的無能啊！”說著說著抱緊我又哭了。

我勸都勸不動，只好對她說：“我會幫你的，放心吧，既然出來了，船到橋頭自會直。”

可她聽了，反而哭得更兇了，整個人貼得更緊，像是要把所有的重量都壓在我身上。她的手抓得越來越緊，指甲幾乎嵌進我的皮膚里，我的理智在那一刻似乎被瞬間蒸發。此時此刻，空氣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。我們的汗水混著淚水，肌膚緊貼，呼吸交纏，像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推著，無法自拔。我閉上眼睛，試圖讓自己清醒，但她的手像是一條藤蔓，緊緊纏繞住我，連同我的理智一起被吞噬了。

當我的身體進入到她的體內時，淚水不由自主地湧出。那是一種複雜的眼淚，包含了愧疚、無奈和深深的自責。面對一個比我大四歲的女人，面對一個不是為愛，也不知道為了什麼的女人，我怎麼能，怎麼能？此時此刻，我想起了在上海的妻子和女兒，想起了她們對我百般信任、充滿期望的臉龐。妻子溫柔的眼神、女兒純真的笑容，這些畫面在我腦海中不斷閃現，讓我感到無地自容。人性的弱點卻讓我不自覺，內心的掙扎幾乎將我撕裂。

之後的日子，她的依賴變得更加明顯，幾乎把我當成了她唯一的依靠。工作是我幫她找的，可她總是哭喪著臉，抱怨工作太累，環境太差。她的哭泣聲時時刻刻圍繞在我耳邊，像是一種無形的枷鎖，將我牢牢綁住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從外面回來，臉上帶著一種異樣的情緒。她坐在床邊，低著頭，沉默了很久才開口：“我不想再工作了。”我愣住了，問她：“不工作，你靠什麼生活？”她抬起頭，眼眶紅紅的，像是蓄滿了淚水，卻始終不肯回答。

“你說話啊！”我有些急躁了，聲音不自覺地提高。她的眼淚終於流了下來，像是決堤的洪水，止不住地往下淌，“有個越南華人……他說他願意照顧我，給我租房子。”她的話像一記重錘，砸在我胸口。

報紙上的有關中國留學生那些事迅速在腦海中浮現，我瞪大眼睛，看著眼前這個曾經依賴我、信任我的女人，內心湧起一股說不出的複雜情緒。她低下頭，肩膀微微顫抖，像是再也承受不住這沉重的生活壓力。

那一刻，我只能無能為力地呆站著，世界彷彿凝固了。痛苦一下子湧滿了整個房間，我意識到，這個世界遠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複雜，還要殘酷，還要沉重。

澳華新文苑

第1210期（B）

胡適墓前念胡適（臺灣行之一）

口述：梁先生 整理：昆西

我曾多次前往臺灣，

年輕的時候出差居多，退休以後更多是人文考察。作為一個文化愛好者，我曾採訪了許多文化名人的故居和遺址。眾所周知，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，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，蔣介石不僅將大量黃金和國寶運往臺灣，還試圖帶走一些國學大師。許多大師選擇留在大陸，為新政權的建設貢獻力量，但也有一些前往臺灣。20世紀60年代末，台灣經濟起飛，成為“亞洲四小龍”之一。這批大師和高級知識份子在推動臺灣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，不僅在經濟建設上，在政治、文化等方面也對臺灣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2025年3月初春，我再次走訪臺灣，採訪文化名人的故居和遺址。這些故居保存情況各異，有些保存完好，有些破舊，有些不開放，甚至還有一些找不到。張大千的故居不對外開放，需通過朋友關係提前預約才能參觀。臺灣大學校園內的傅斯年墓地



■臺北市胡適公園

頂部斑駁，缺乏維護。

這次我花了一天的時間拜訪了胡適公園和紀念館，這裡的保存和維護情況相對較好。胡適墓園位於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公園，建於1962年胡適去世時，也是胡適妻子江冬秀與長子胡祖望的埋葬處。胡適墓位於公園後山，與中央研究院隔街相對，周圍保留了南港的自然環境和原生植物。墓前有一個池子，從池旁石階而上可見胡適墓身，約十六個梯階。

墓身上有墓誌銘，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，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。這些文字原本埋藏在墓穴，經胡適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第四十九次會議後改立墓前。文云：

“這是胡適先生的墓。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，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。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，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，為民族的尊榮，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，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，現在在這裡安息了！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，陵谷也會變易，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，將永遠存在。”

胡適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，他的一生猶如一幅歷史畫卷，在思想革新、學術探索、政治立場、教育理念以及社會活動等諸多關鍵領域，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深刻一筆。

首先在新文化運動中，胡適是弄潮兒之一。1917年，他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提出的“八不主義”（從不用典、不用陳套語、不講對仗、不避俗字俗語、不作無病之呻吟、不模仿古人，到須講求文法、須言之有物），為文學的平民化和現代化指明瞭清晰的方向。

其次，在個人品德

方面，胡適展現了令人欽佩的一面。他的婚姻是傳統的包辦婚姻，但他依舊堅守責任，與妻子江冬秀攜手共度一生。他一生資助了眾多才子和普通人，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上遇到困難的青年學者，還是生活陷入困境的普通百姓，只要他力所能及，都會伸出援手。這在董橋寫的書《讀胡適》中有詳細的記述。不僅解決了許多人的實際困難，更成就了不少人的人生。

在婦女解放運動方面，胡適堅定支援男女平等，鼓勵女性接受教育，追求理想和事業。他的倡導和影響下，許多女性開始覺醒，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。

面對批評，胡適保持大度和寬容。他從不因批評而惱羞成怒，而是以客觀、理性的態度分析和接受。例如，在學術研究中，當他的觀點受到質疑和批評時，他會認真聽取對方意見，反思自己的研究，這種豁達的學術胸襟贏得了學界的廣泛尊重。

當然，胡適也有遺憾。他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和《白話文學史》未能完成，儘管這兩部著作在出版后受到了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。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。胡適對西方文化的推崇有時近乎盲目，他堅信引入西方思想和理念能改造中國社會，但忽視了中國國情的複雜性。中國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、社會結構和民族心理，簡單照搬西方模式難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。

轉眼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節。清明節是台海兩岸及全球華人的共同文化，不僅是共同記憶，更是需要傳承的重要節日。“清明節我們站在父祖輩的墓前，一方面是追思他們的遺志，另一方面要擔起承前啟後、繼往開來的責任和擔當。”



■臺北市胡適公園內的胡適墓



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：解讀劉虹

何與懷

大道、對真理百折不撓的尋找，對破譯客觀和主觀之謎的永恆渴求——這種精神化的、形而上的求索，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、創造物質文明的動力，也使人自身在主觀世界裡不斷得到昇華，不斷被更高地文化著。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價值觀——只有具備強烈求真欲、身心潔淨的人，才不會為一時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羈絆，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囂塵上時有自我放逐的勇氣……

為此，她把一代大師陳寅恪的名言當作自己的座右銘：獨立之人格，自由之思想！

五

劉虹曾在詩集《結局與開始》後記中，把到深圳之前和之後的詩歌創作作了一個盤點：前一階段可稱為廣闊些的“大地憂思”，後一階段則更多的是切近的“存在之痛”。抒情的熱與冷轉換，同具生命的真誠和質感，只是後階段更多一些欲飛折翅的無奈與惶然。

“大地憂思”正如當時的朦朧詩那樣，主要指憂國憂民的意識，包括對民族劣根性和文化傳統的反思，對“文革”和中國苦難的反思。（未完）

（接上期）劉虹回顧，她一生基本都是一個人在面對社會。十五歲就參加“革命”，招為邊境線上的小報務兵，太小就嘗到了生活的陰暗面；長期的孤獨感，加上一生體弱多病。總是在疾病中煎熬的她，有時真是把寫作當成與生命賽跑，活一天，寫一天。如寫不動了，生命也就失去了意義。她看重生命的尊嚴和品質，不能想像重病纏身、苟延殘喘、乞人憐憫、不能思考和寫作的日子是不是需要過下去……總之，多病甚至也成為她目前寫作的動力，懷著很強烈的緊迫感，要只爭朝夕。她又有太多的與世俗格格不入的思想，骨子裡極悲觀，而她本來的天性是開朗活潑的。這樣，劉虹一直有一種悲哀：健碩的靈魂追求，與病弱的肉體之間，構成她生命的矛盾衝突。對此她曾報以苦笑——也好，否則她可能早就成了行動上的激進的革命黨人了。

在孤獨、痛苦和高壓下，劉虹卻始終能持守率真、正直的天性，絕不為世俗功利扭曲人格、卑躬屈膝、拍馬鑽營、苟且媚俗。正如劉虹自己所說：

求真欲，是人類的基本本性，也是脫離動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。對宇宙、對自身無休止的發問，對